



# 中国传统剑文化考论



邢金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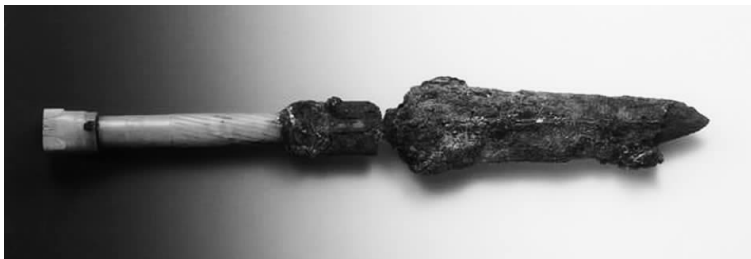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许慎《说文解字》剑，人所带兵也。从刃，金声。段玉裁注：桃氏为劒。有上制，有中制，有下制。注云：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儿大小带之<sup>①</sup>。东汉刘熙也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剑器，脊直，双刃，以撩刺为主，风格轻灵洒脱。剑柄上适佩剑穗，称为“文剑”，无剑穗的称为“武剑”。冷兵器时代，剑是防身和作战的一种短兵器，有“百刃之君”、“百兵之帅”之美誉。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和传承中，经过侠士的(武)术化、道教的神化与儒家的写意洗炼，剑器已不再是单纯的兵器和舞具，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气质和中国特有的“侠义”崇拜，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地位、心态、风度以及它所包含的哲学意境，在国人心中占据着远非其他兵器所能望其项背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剑(舞)文化。在华人世界里，崇剑、尚剑的流风习俗至今绵延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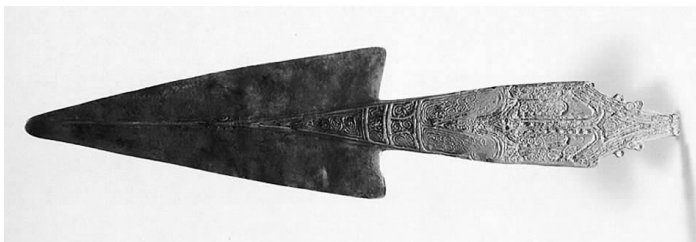
## 一、剑器之发展

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管子》又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凡此种种记载，表明了一个史实，远在我国黄帝、蚩尤时期，就发明了剑器，可以想象那只不过是剑的雏形罢了。史书实载表明，剑器在商朝中后期已大致成形，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无剑格，由矛头和匕首结合演变，用青铜灌注、打磨而成。《礼记》记载，剑产生于商代，最初仅长十余厘米。《逸周书·克殷解》也记载：武王克商时，武賁之士便是持剑而行。西周大军攻入朝歌后，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折

之以黄钺，折县(悬)诸太白。”这里的轻吕就是宝剑的名称(《史记·周本纪》：司马迁改“轻吕”为“轻剑”。)西周初年，经过武王以“修文教”为目的的调整之后，剑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兵器属性，兼有了人文教化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兼备了健身、娱情和修养心性的体育功能。剑制进一步规范：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的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和身之间的护手称“格”(也为“卫”)。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用绳缠绕用来护手，绳称为“緼”，剑柄尾端旋环称做“铉”，剑鞘也谓之“室”(也称为“鞘”)。短剑也称“匕”，可用于直刺，即直兵推之(《晏子春秋·卷五·崔庆却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第三》)，或用于“遥击”，即掷剑<sup>②</sup>。《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故事描述的“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随拔剑刺死了荆轲”的场景，可以想象，荆轲先藏于图卷中，最后努力一掷不中，想用来击杀秦王的“匕”，就是一把短剑。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被誉为“天下第一剑”、“镇馆之宝”，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长度仅为33厘米的玉柄铁芯铜质剑(图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长度仅为30.9厘米的云



图一 西周晚期玉柄铁剑(三门峡虢国墓出土)



图二 战国云纹扁茎青铜匕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纹扁茎青铜匕首(图二),也证实了史书关于商周以前剑短如匕的记载。西周晚期以后,剑制逐渐加长,达到40~60厘米。

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这时期的铜剑大部分都是直剑,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长度增加,一般都在40~60厘米。东周青铜剑,以吴、越两国的质量较好。《周礼·东官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湖北江陵望山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6厘米,身满饰菱形纹,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脔(剑)”。时隔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长剑在用于“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墨子·节用中》)。在商至汉初的千余年间,剑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活跃于战场上。

与此同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巴蜀出现无剑格的柳叶剑(图三);东北辽西走廊的西拉木伦河、英金



图三 战国巴蜀青铜柳叶剑

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包括今天的朝鲜半岛,出现青铜曲刃剑。曲刃剑短柄,使用时为了调整短剑的重心,剑首常配加重器(图四)。也有学者认为,西



图四 曲刃剑加重器(用于调节短剑重心)

周短剑与春秋后期勃然兴起的吴越青铜长剑并不一定有承袭关系,也就是说不但是器物自身各有渊源,而且使用技术上也各成区域。李学勤先生认为,它们应属于不同的区域文化范畴,有着各自独立发展空间和历程,彼此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无独有偶,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中介绍了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张政烺先生认为“剑非吴越人所发明,大约从塞外来”。李平心先生认为“轻吕、径路并即之对音,剑实来自西域”。这些精辟的观点,对我们深有启发,也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去研究、考证。

由现代考古和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春秋中晚期,已有钢铁铸剑的工艺。在湖南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了我国目前最早的一把钢剑,剑身长38.4厘米;时代稍晚的湖南等地楚墓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最长的超过了1.4米。这可以表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后期是青铜剑、铁剑并用的时代。这个时期,制造优质宝剑的中心在棠溪(今河南西平县)。《史记·苏秦传》记载,苏秦在游说韩宣王联赵抗秦时强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出现了当时“十里棠溪十里城”、“工匠七千,竟夜如昼”、“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酒酣掩翠柳,铁歌奏更天”的冶铁铸剑的热闹场景。当时剑的长度增加到1米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镀有一层铬盐氧化物,能防锈防腐,呈乌黑的光泽。《史记》记载,秦代剑长90多厘米,而秦始皇的佩剑长达7尺(约1.46米),以至于秦王嬴政在拔剑对付荆轲的刺杀时,竟因剑身太长而拔不出来。近几年,秦始皇兵马俑及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证明了这一点。剑身的加长,增添了剑的劈、撩、斩、扫等技法,促成了剑法和剑术的多样化,为后世剑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秦自宋,关于剑器的选择使用,郑锷对于剑有所详解,他这样说道: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选择不同的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要使之各适其用而已。因此分剑制为三等,以适合三等带剑之士,什么人用什么剑则自取其便。剑柄长五寸,剑身若是剑柄的五倍,那么就该有三尺,重九镒,也就是三斤十二两,长之极,重之至,故谓上制。只有高大有力的剑士可以佩带,所以称为上士之制。剑身是剑柄的四倍,那么剑之长则有二尺五寸,重七镒,也就是

二斤十四两,长短轻重取其中,谓之中制。适合普通身材和力量大小的人使用,故称为中士之制。若剑身只有三倍剑柄长短,则只有二尺,重量只有五铢,则只重二斤一两三分,轻而且短,称为下制,矮小羸弱者适用。

可以看出,从西周初期的“虎贲之士说剑”,春秋战国时代剑文化的勃兴,秦汉间人们对剑的崇敬,到太史公司马迁将“论剑”提高到“与道同符”的高度:“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太史公将认为“论剑”是一门“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的大学问,这显然就是汉以前称剑技为“剑道”的原因,其所指已远远超出了剑的临战击刺之效,而是在讲剑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讲剑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古代达官士人往往书剑并举,以剑比德,将剑人格化,对自己心爱的宝剑美起名曰“轻吕”(周武王剑)、“干将”、“莫邪”(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青龙剑”等等。足见太史公所言非虚。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利于骑兵的大量使用,到西汉末年,钢铁兵器已完全取代了青铜。战争中,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较快,马上的短兵器显然要注重易发力、利砍切的特性。随后长剑逐渐被长刀取代,并完全退出战场。中国刀剑工艺的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指的是东汉时期出现的“百炼钢”。百炼钢技术是将钢铁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提炼出最精纯的钢。此时铸剑,也将剑刃有两度弧曲变得平直使其更加锋利,剑锋的夹角也逐渐加大,这些变化足以说明剑的功能已经由直行推刺,转用刃部劈、砍、削<sup>⑥</sup>。《三国演义》有这方面的描述,赵子龙在长板坡大战中,得曹操三尺青龙剑,削铁如泥,助其七出七入,救少主于乱军之中。可以想象,赵云所得的那把剑,应为“百炼钢”铸造的长剑。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动荡,百业俱废,加上匠人们狭隘的封建、保守思想,使本就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百炼钢冶炼技术逐渐失传。

晋、唐以后剑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代表权利和身份的礼器。但是,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佩剑不可随心所欲。据唐代徐坚等编纂的《初学记·武部·剑》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冶炼钢铁的

技术才逐渐恢复和发展。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

由于元朝对铁质刀具的严格管制,极大地限制了传统宝剑冶炼技术。到了明朝中后期,刀剑的研制更是每况愈下。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怨道:“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清朝“康乾盛世”期间,乾隆皇帝尤其喜爱刀剑,上好下效,使当时的冶炼技术大有进步,出现了花纹钢的技术,制作了一批优质宝剑。但是根据“中国自唐朝后就少有优质刀剑记述”以及考古发现来推测,不少学者认为:百炼钢的技术,唐朝以后就可能失传了。清朝的扣鸣刀花纹钢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印度学习的。

## 二、剑舞文化考述

剑舞是伴随着剑术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始于春秋,兴于唐宋。其招式是以劈、砍、崩、撩、格、洗、截、刺、搅、压、挂、云等为主<sup>⑦</sup>。剑术分单剑与双剑两种,以单剑为多。千百年来,演绎成了武当剑、达摩剑、太极剑、龙行剑等诸多著名的剑术套路。其共同特点是刚柔相济、吞吐自如、轻快飘逸、矫健优美。极具观赏性、娱乐性和健身性。

关于剑舞,较早的记载源于《孔子家语》:“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诗·大雅·公刘》也载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的诗句,描绘的就是手拿盾牌(干)和斧(戚)跳舞的情景。以上史实表明,剑舞产生的上限,可以推到春秋时期,甚至更早。《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也有记载:有女子擅长剑道。越王听说这个人,即命人寻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于是应召而往。越王问曰:“剑之道如何?”处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王听后即加女号,为“越女”<sup>⑧</sup>。事实上,手执兵器舞蹈,确是上古遗风,发展到秦汉,已相当盛行。

秦汉时期,剑舞已经作为舞蹈形式出现在外交场合。著名“鸿门宴”中,就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项庄舞剑”故事。不过项庄的舞剑,绝不是为了艺术表演与交流,而是假献舞之名,务行刺之实罢了。



剑正式作为舞具进入艺术表演领域,应当在汉武帝时代。据史书记载,由汉武帝钦定的规模宏大的百戏演出中,就编排了剑舞节目。那时的剑舞,常与杂技相结合,以便在增加舞技难度的同时增加舞蹈的吸引力和艺术魅力。汉代画像石(砖)上刻画的剑舞、以及出土的墓葬壁画可作旁证(图五)。



图五 汉代击剑图画像石拓本(河南郑州出土)

魏晋时期,已出现了剑术教师,形成了剑谱(或专著)和剑术流派。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叙》语:“余幼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余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sup>①</sup>。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剑术的高超和斗剑之风的兴盛、时尚,颇有现在击剑运动的味道。据载,曹丕曾师从洛阳当时的剑术名师王越,剑术高超。

剑舞的发展与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降低和礼仪作用的提升有直接关系。汉初,剑逐渐被利于砍杀的刀所取代。一些将校官吏由佩剑改为佩刀。汉魏以后,佩剑的用途除了防身外,更多是用于作佩饰。西晋时,朝官上殿所佩带的剑,竟改为木制品,成为纯粹的装饰品、或者成为配有玉佩饰的身份标识<sup>②</sup>。隋唐时期,剑器逐渐演变成了王权或者会所某些特权的象征,出现了广为民众传颂或旧戏曲里演绎的上吓君不正,下打臣不忠的“尚方宝剑”文化。史书就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举行祭天仪式时的盛况:“皇帝充冕龙衣,腰挂鹿卢玉具剑,身着绶带三玉环,伏拜于地,先以祷词祝告上苍,然后奠圭祭酒再拜,最后礼祭配享诸帝。”

盛唐宫廷的剑舞文化。唐朝,是我国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民风开放的朝代。文化的多元性,也催生

了异彩纷呈的剑舞艺术。唐玄宗偏爱礼乐,他创建“教坊”、筹建“梨园”,培养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掀起了朝野上下的剑舞热潮。在八千梨园弟子中,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公孙氏的女艺人,她表演的《剑器》(双剑)舞,浏漓顿挫,轻快飘逸,飙腾敏健,气势宏伟。开元五载,尚处幼年时期的杜甫,在郾城观看了公孙氏的《剑器》舞,50年后,于夔府元持宅邸中又欣赏到了公孙氏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深有感触地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诗人以极其激赏的心情,描绘了当年目睹公孙氏舞蹈的感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吴人张旭在邕县也多次观看过公孙氏的《剑器》舞,并受公孙氏抑扬顿挫剑法的启示,练就我国书法一绝——“狂草”。宫廷剑舞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剑舞文化在全国上下成为一种时尚,极大地推动了剑舞文化在民间传播与发展。

唐朝军营的剑舞文化。唐代剑舞不仅用于御前演出和民间娱乐,军队中也比较流行,多用来犒慰三军将士,常用战鼓伴奏。诗人姚合《剑器词》二首云:“圣朝能用将,破敌速如神。掉剑龙缠臂,开旗火满身……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这两首词描绘的是战斗胜利后,由军人表演《剑器》舞,以示庆贺。出身军营的裴旻将军也是一位剑舞名家。文宗时,曾诏“李白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sup>③</sup>。

唐朝文人的剑舞文化。在唐代,剑舞更为文人所崇尚。唐是诗的时代,而剑与酒则是唐代诗人创作灵感的催化剂。文人剑舞多在酒酣之时,在乐器(多以琴、笛、箫为主)伴奏下应节而舞,将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才不遇的感慨,离乡别亲的愁绪,通过剑舞抛洒和发泄,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思想的净化。李白一生好酒爱剑,写下了“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酒酣舞长剑”,“三杯拔剑舞龙泉”的潇洒淋漓诗句。杜甫二十岁挟剑浪迹天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经历了流离颠簸之后,老年时发出了“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的深沉凝重感叹。边塞诗人岑参诗云:“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大量文人的参与,使剑舞艺术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唐朝道家的剑舞文化。唐朝时期道教盛行。在剑与道的结合过程中,一方面,道家要借助有灵性的剑施道布法,让人们相信他们有“通天之术”,达到驱鬼逐魔,治病延年的效果;另一方面,经过道家的斟酌与研修,使剑术从军用性质中脱离出来并向套路、健身方面快速发展。剑和道的结合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现代中国剑术理论、套路技术等剑文化深受剑道文化的影响<sup>①</sup>。

由于唐朝政治的开明、社会的繁荣,使本来为少数皇亲国戚、封建士大夫所掌握的剑舞艺术突出宫墙扩散向民间,并迅速普及。也正是由于这“全民参与”、立体化的发展,使得剑舞艺术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以身领剑、人剑合一”、“双剑舞”、“剑配乐舞”、“剑道文化”等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剑舞理念和套路,形成了在中国剑文化发展史上璀璨夺目的盛唐剑舞文化。

北宋时期,宋太宗以剑舞之法来训练军士。《武编》载述:宋太宗选军中勇士数百人,教舞剑之术,这些人都能掷剑于空中,并能灵活跳跃起来接住飞剑,妙绝无比。这些高超绝技,对后来剑术套路、剑术表演的发展以及武侠小说中剑客的技艺描述影响都很大,至今我们演练的武术套路中,亦能隐约见其踪影。南宋至元朝,从舞蹈意义上讲的剑舞基本上从艺术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元人普遍带刀不带剑,自然也就谈不到剑舞了。

明朝,各武术流派在剑术应用基础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如何良臣《阵纪》记载了卞庄子的“纷绞法”;王聚的“起落法”;刘氏的“愿应法”;马明王的“闪电法”;马起的“出手法”等剑法心得,这些剑法为后世剑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sup>②</sup>。

清朝时期,剑舞多在戏曲中出现,民间少见剑舞者。由于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从当时的政治角度讲,聚众舞剑,估计是不会允许的。汉人出于对剑的情结,拿把道具剑在戏曲舞台上表演一番罢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记述一位名叫福云的武生,“善技击,所演《卖艺》、《三岔口》诸剧,免起鹞落,矫捷绝伦”。

新中国成立后,剑舞艺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梅兰芳、叶圣兰等戏曲名家借鉴传统剑舞艺术,创造了《霸王别姬》中的双剑舞,让剑舞艺术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文学工作者也运用文学夸张的手法,将“剑器”神化,将“剑舞”的功能扩大化,创编了一部

部脍炙人口的武侠体小说。如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等。他们对剑及剑文化的演绎和诠释淋漓尽致,令人神往,对宣传和发展我国的剑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需求,探索、挖掘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北京的马来旺先生40年练武不辍,并在中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地收徒传剑。20世纪60年代以来,河南西平籍的天津大学毕业生高锡坤和儿子高庆民立志挖掘棠溪宝剑遗产,数十年间如一日,刻苦研制不止,终于使销声匿迹达千年之久的棠溪宝剑再现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铸造了“香港回归剑”、“澳门回归剑”、“千年龙剑”、“中华第一剑”等,并将它们作为国礼赠送给相关国家和地区。最近,他们又将新研发的国威剑、法威剑、军威剑、奥威剑,分别赠送给人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奥组委,使棠溪宝剑打入奥运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指定国际礼品<sup>③</sup>。经过我们后人的努力,凝结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传统的剑文化定能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 三、结 语

剑器的文化内涵,就是正义、正气的象征,是我们民族文化——“龙”文化的集中体现,至今仍丰富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国剑文化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华夏民族对世界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挖掘、整理和保护中国传统剑文化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许慎:《说文解字》,第93页,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② 陈建初:《释名·释兵·考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剑与刀》,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一卷),第125页,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年。

⑤ 赵国庆:《中国剑术文化与当今剑术套路演练之研究》,《武汉体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⑥ 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一卷),第176页,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年。

(下转第106页)

器舞的姿容。敦煌写卷中,还有描绘剑器的诗词。如 P.3591 号“洞山和尚神剑歌” P.3633 号“龙泉神剑歌” P.3821 号“三尺龙泉剑”,唐代诗人岑参有“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之诗句。

敦煌文献和壁画中绘有许多有关古代军事作战、军事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图像(图一五)。

#### 四. 结 语

敦煌的民俗、游戏、娱乐、竞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民俗、游戏、娱乐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事象一起,整合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结构。无论物质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层面,对于人类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其自身的客观需求和内在魅力。在其活动过程中,人是活动的主人,追求的是参与性,体验的是愉悦和满足。在敦煌民俗休闲活动中,其所带来的娱乐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一种对活动的愉悦和审美体验产生互动回应的生活方式。

敦煌竞技,但一直属于民俗范畴,并没有独立形成真正的体育运动。因为,古代敦煌的游戏、娱乐、竞技等长期以“技艺”为主,并未上升到“道”的境界。它缺乏直观体悟、辩证思维等哲学意蕴。它只是以“技艺”、“绝艺”等词汇来体现技术与艺术相互交融的特征,缺乏公正、公平的竞赛机制。

当民俗、游戏、娱乐、竞技成为敦煌广大民众需求的载体时,也就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体验自身或他人文化,回归到一种古朴的人文环境中,追求成长中的真善美和生活质量提高等存在价值,人类在休闲时空内,人类不受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的束缚,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各种能力、爱好、特长等,选

择自己喜欢的休闲内容,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智慧,实现个人价值。

#### 参考文献:

- 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华书局,2010年。
- 傅起凤、傅起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 李金梅、李重申:《丝绸之路体育图录》,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郭泮溪:《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 于左:《玩在唐朝》,中华书局,2008年。
- 颜绍泸:《竞技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
- 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民俗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
- 王定璋:《中国民间娱乐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 ⑪ 刘婷:《民俗休闲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⑫ 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⑬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8年。
- ⑭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
- ⑮ 于文杰:《艺术发生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⑯ 王俊奇:《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年。
- ⑰ (美)理查德·F·马欧:《娱乐体育与管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 ⑱ 王前:《“道”“技”之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
- ⑲ 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 ⑳ 罗新本、许蓉生:《中国古代赌博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上接第 97 页)

- ⑦ 李英等:《剑舞考论》,《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10期。
- ⑧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
- ⑨ (三国)王肃:《孔子家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 ⑩ (后汉)赵晔:《吴越春秋》之勾践阴谋外传,凤凰出版社,1999年。
- ⑪ 田余庆等编译:《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⑫ 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
- ⑬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
- ⑭ 郭晓峰:《道与中国剑术》,《中华武术》1996年。
- ⑮ 万贾:《剑道之魂》,贾汪论坛, www.xzjw.gov.cn. 2005,4,13。
- ⑯ 《让棠溪剑文化光耀神州》,《天中晚报》2005年11月25日(03版)。





## 本期导读

### 崔乐泉：《原始形态体育器械的考古学分析——史前劳动工具与原始形态的体育器械》

人类文化的产生,由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人类的劳动开始的,而人类的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工具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肇始,意味着人类以工具为手段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开始。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迈上原始体育形态的第一步台阶时,劳动工具的使用起着重要作用。

人类原始的劳动工具,是一种多用途的“人工器官”,因此,史前的劳动工具,是反映原始人类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这些工具既是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进行身体运动的主要辅助手段。当原始生产工具由于加工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时候,它们也开始被用于人类进行自身改造的活动中去。从人类利用工具作为器械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进行有意识地自身改造开始,人类原始的体育形态就形成了。但这一发展却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原始的体育运动器械处于和生产工具不分的状态,即主要用于狩猎、采集的许多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用于身体练习和娱乐活动。如旧石器在晚期,除了石球、石镞和石矛几种新器形的出现外,还有斧形小石刀、雕刻器、钻头等。这些主要是作为切、刮、剥工具来应用于人们生活中的。不过,像小石刀等,后来多数是作为复合工具使用的,因此,它对石镞、石矛等复合工具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原始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进步,也就潜在地为专用原始体育器械的诞生作好了准备。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扩大,许多生产工具在功能方面开始分化。虽然这时的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在制作方式上,磨制的已占多数,且更为精致,器形种类也大大增多了;同时,骨、角、蚌、木、陶等质料的工具也更加丰富。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手段增强了,同时,适应人类运动形式的需要,也演化出了一些颇具专门化的运动器械。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工具的改进,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对原始体育形态来说,工具的进步与类型的增加,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活动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在原始体育上的活动方式。

通过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原始时代工具的发展和功能特点的转化,可以看出原始体育形态从形成到逐步发展的事实。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种类少,形式简单,且多为一器多用。像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甚至石镞、石球等,所显示出的原始体育活动的某些功能只是间接的,其主要特点还是作为当时人类生存谋生的手段。至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和原始经济生活的进步,人们活动领域和内容的扩展,许多工具已经不是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简单接触所产生的了。这些经过人们精心设计的工具,在原始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许多工具在最初由适应狩猎业和原始农业,逐渐也具有了原始体育活动器械的功能;一是出现了直接用于原始体育活动的器械。这两种变化,使原始的生产、生活工具在推动原始体育形态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完全分离转化出来,并向文明时代体育形态演化创造了条件。

### 邢金善：《中国传统剑文化考论》

冷兵器时代,剑是防身和作战的一种短兵器,有“百刃之君”、“百兵之帅”之美誉。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和传承中,经过侠士的(武)术化、道教的神化与儒家的写意洗炼,剑器已不再是单纯的兵器和舞具,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气质和中国特有的“侠义”崇拜,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地位、心态、风度以及它所包含的哲学意境,在国人心中占据着远非其他兵器所能望其项背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剑(舞)文化。在华人世界里,崇剑、尚剑的流风习俗至今绵延不绝。

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表明远在我国黄帝、蚩尤时期,就发明了剑器,但那只不过是剑的雏形罢了。史书和考古资料表明,剑器在商朝中后期已大致成形。西周初年,经过武王以“修文教”为目的的调整之后,剑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兵器属性,兼有了人文教化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兼备了健身、娱情和修养心性的体育功能。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但在商至汉初的千余年间,剑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活跃于战场上。

晋、唐以后剑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代表权利和身份的礼器。但是,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佩剑不可随心所欲。据唐代徐坚等编纂的《初学记·武部·剑》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与剑器在古代逐渐发展和盛行的同时,剑舞也伴随着剑术的产生而出现了。它始于春秋,兴于唐宋。其招式是以劈、砍、崩、撩、格、洗、截、刺、搅、压、挂、云等为主。剑术分单剑与双剑两种,以单剑为多。千百年来,演绎成了武当剑、达摩剑、太极剑、龙行剑等诸多著名的剑术套路。其共同特点是刚柔相济、吞吐自如,轻快飘逸、矫健优美。极具观赏性、娱乐性和健身性。

剑舞的发展与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降低和礼仪作用的提升有直接关系。汉初,剑逐渐被利于砍杀的刀所取代。一些将校官吏由佩剑改为佩刀。汉魏以后,佩剑的用途除了防身外,更多是用于作佩饰。西晋时,朝官上殿所佩带的剑,竟改为木制品,成为纯粹的装饰品、或者成为配有玉佩饰的身份标识。隋唐时期,剑器逐渐演变成了王权或者会所某些特权的象征,出现了广民众传颂或旧戏曲里演绎的上吓君不正,下打臣不忠的“尚方宝剑”文化。北宋时期,宋太宗以剑舞之法来训练军士。南宋至元朝,从舞蹈意义上讲的剑舞基本上从艺术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元人普遍带刀不带剑,自然也就谈不到剑舞了。

明清时期,各武术流派在剑术应用基础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这些剑法为后世剑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新中国成立后,剑舞艺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戏曲艺术、杂技艺术中的剑舞之技大放异彩。而民族遗产的发掘与研究,更使古老的铸剑艺术纷纷再现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铸造了“香港回归剑”、“澳门回归剑”、“千年龙剑”、“中华第一剑”等,并将它们作为国礼赠送给相关国家和地区。最近,国威剑、法威剑、军威剑、奥威剑等,又被研制出来并分别赠送给人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奥组委等。经过后人的努力,凝结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传统的剑文化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剑器的文化内涵,就是正义、正气的象征,是我们民族文化——“龙”文化的集中体现,至今仍丰富和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国剑文化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华夏民族对世界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挖掘、整理和保护中国传统剑文化任重而道远。

### 李重申、李金梅:《论敦煌古代的游戏、竞技与娱乐》

敦煌从两汉起即为西域重镇,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使它在欧亚文明互动、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尤其是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彩塑、遗书、帛绢画等,不仅蕴藏着古代宗教、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无限丰富的遗产,而且也记录了敦煌古代人民的节日欢娱、民间游戏、民族竞技、军事习武、传统养生等世俗生活的信息。在古代敦煌的民俗、游戏、娱乐和竞技活动中,那些过往不复、无处觅求的狩猎、射箭、角抵、百戏、摔跤、相扑、健美、举重、体操、技巧、棋弈、投壶、游泳、跳跃、竞走、投掷、长跑、划船、马术、蹴鞠、马毬、步打毬、武术、气功、游戏、踏青、秋千、登山、滑沙、舞蹈、养生、保健等画面和文献记载,多被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地保留了下来。

敦煌的民俗、游戏、娱乐、竞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民俗、游戏、娱乐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事象一起,整合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结构。无论物质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层面,对于人类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其自身的客观需求和内在魅力。在其活动过程中,人是活动的主人,追求的是参与